

对高校人才培养中若干关系的思考

◆胡和平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在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的人才需求不同,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也不同,有共性规律,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当前,随着大众化进程,我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学校规模不同程度扩大,大学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大学分层逐渐形成。同时,大学的职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成为重要任务。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正逐步成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新的形势和任务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才培养的地位和作用。2011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要坚持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并对全国青年学生提出了“三个紧密结合”的殷切希望,即把文化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把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工作,为学生做到“三个紧密结合”创造充分的条件,是摆在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本文就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几对关系谈些认识。

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

关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争辩由来已久,孰优孰劣始终没有定论。事实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并不对立,而是需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都是一种成熟的教育理念,在大学教育中二者均不可或缺。最早的大学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的,而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逐渐出现了专业教育。在专业教育不断发展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仅有专业知识,仅开展专业教育,是远远不够的;不能只培养“工匠”,要培养人。于是,很多大学提出要回归通识教育,事实上,无论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是很好的教育理念,问题是我们能否将二者很好的结合。

不同学校不同时期在二者的结合上可以有所侧重,关键是要在实践中做到位。这两种教育理念都有各自完整的逻辑体系,在以一种教育理念为主的同时要兼顾另一种。

以清华为例,解放前强调“通识为本,专识为末”。梅贻琦校长《大学一解》文中指出: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他的理由是,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为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苏联,强调专业教育,辅以通识教育,蒋南翔校长倡导“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等教育理念,学校为国家工业化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工程技术人员。这两种不同侧重点的结合,都有很多成功经验。关键是要把两种教育理念都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同一个目的服务,并与特定的社会需求和人才特点紧密联系起来。

无论通识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要同我国的教育传统与实际相结合,在借鉴中有所创新。很多学者在考察了国外通识教育后,认为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学分太少。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开设的思想政治教育、外语、体育等课程都是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通识教育的问题不在于学分太少,而在于如何进行有效整合,从而使通识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素养、合理的知识结构、多样的思维方法和全面的综合素质,使专业教育更适合于学生获得精深的专业知识、专业化的科学方法和专门的职业能力。当然,不同的学科也有所不同,基础性学科通识性强一点,而工科等应用性学科则专业性更强一些。

二、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的关系

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课内教育重要,课外教育也重要。课内教育侧重知识传授,课外教育侧重能力培养,特别是对学生创新能力、协调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的培养,二者各有分工,相互补充。

课外教育和课内教育一样也需要全面谋划、精心设计。学生至少有一半时间在课外,忽略或轻视课外教育,也就丧失了一半的教育机会。因此,组织好、利用好课外教育环节,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从我国实际来看,社会实践、课外科技活动和课外文体活动是几种主要的形式。社会实践是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上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重要途径,也是课外教育的关键环节。清华大学坚持实践教学不断线,要求“每名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参与一次社

会实践”,涌现出中国农村能源调查、中美大学生教育扶贫等一批精品项目。目前,学校每年有1.3万多名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对于激发科研创新兴趣,培养创新人才至关重要。学校以首创的“挑战杯”学生科技作品展览为龙头,形成了日趋完善的课外科技活动体系。1989年,“挑战杯”走向全国,现已成为全国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重要平台。同时,我们也特别注重学生课外文体活动,上世纪50年代就成立了集中住宿的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对于课外教育,每所大学都有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但相同的是需要精心设计和实施,真正融入到人才培养过程中。

课内教育和课外教育要有机衔接、密切配合,避免“两张皮”现象。在我国很多高校,学生一入学就按系分班,班集体成为课外教育的重要载体。清华在课外教育方面注重学生班集体建设,让学生在集体中成长,在全国率先评选学生先进集体。注重班集体建设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对育人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不断发扬。国内外一些名校虽然没有像我们这样严格的行政班级概念,但是都在学生集体建设中有各自独特的成功做法,如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院制。我国香港中文大学为了同专业性学院区分,称为书院。学院、书院是学生共同生活的地方,也是组织集体活动、锻炼各方面能力、实现全面发展的主要平台。法国有一所大学为了增加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学生的交流,开阔学生视野,按体育爱好来分班,每周在一起锻炼两次,每次不少于2小时。从职责分工看,课内教育更多由任课教师主导,班集体建设等课外教育更多由班主任和学生工作系统引导。如果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两张皮”现象,就会影响了人才培养整体成效。因此,课内教育和课外教育要结合好,两个工作系统必须结合好,充分沟通和协作,真正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使培养人的工作成为有机统一体。

优秀的大学文化和优美的校园环境也是课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会潜移默化地教化、熏陶和引领学生,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要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弘扬大学精神和优良传统,倡导良好的校风学风,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优美的校园环境也是如此。有位清华校友说,他在清华入学第一次看到大礼堂前的大草坪时,印象非常深刻,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可能正是因为大礼堂前这个环境,使他感觉到了在一个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殿堂。所以,校园环境除了要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要静谧,使学生能够潜心、踏实地学习。

三、共性教育和个性教育的关系

共性教育是指对于学生的一般性要求,体现在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计划、教学方法之中,是普遍性

规律的反映,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基本前提。个性教育是人才培养中矛盾特殊性的反映,指根据个体的身心发展规律,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不拘一格,使学生的个性和潜能得以充分发展,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要求。共性教育和个性教育是紧密联系的,没有一般性的要求,学生的发展就失去了基础;没有个性的充分发展,学生的创造性和潜能就难以充分发展。

做好共性教育需要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及时更新教育理念,适时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共性教育体现在学校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上,相对稳定,但并非一成不变。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关键是要更新教育观念,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清华大学从1953年开始召开全校性的教学讨论会并形成传统,后来更名为“教育工作讨论会”,定期讨论人才培养工作,一方面可以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另外可在讨论中使师生达成共识,为教育教学改革做好理念上的铺垫。20世纪90年代末,学校组织的教育思想大讨论,形成了“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人才培养目标。去年学校邀请国际专家对12个学科进行评估,他们对于本科人才培养总体评价很好,认为学生基础扎实,但是指出基础课讲授的内容陈旧,与现代科技联系不紧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例如一些基础课教材多年不变,与世界科技前沿的联系讲得不够,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从专业课来看,则存在开得太多、太散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认真研究并开始修订本科生培养计划,希望把培养计划、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建设得更好。

做好个性教育关键在于建立灵活的机制,给予学生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学生的个性发展是培养创造性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在教学管理和评价标准上改变管得过死、要求过于统一的状况,为多样性思想的产生创造良好氛围,为学生个性发展和创造性培养提供适宜的土壤和环境。百年清华,不拘一格育英才,留下了许多佳话。比如中文、历史考满分,物理5分、数学0分的钱伟长先生,在清华后来念了物理;钱钟书先生报考时数学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而被录取;仅是初中毕业的华罗庚先生因发表一篇数学论文,被清华破格聘用。这些故事都体现了过去在招生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灵活性。最近,学校在全面修订各学科本科生培养方案的基础上,推出“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构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特区。同时,也在探索多样化的招生模式,不拘一格吸纳选拔各类优秀学生。给学生更多自由,使一些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在个性教育上要十分重视机制和空间,根据学校实际选择适合的教育理念并付诸实施。

共性教育和个性教育必须有机结合,从而实现相互促进。共性教育和个性教育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的,良好的教育一定是二者的高度协调和统一。蒋南翔在担任清华

文化自觉自信的当代价值与大学的新担当

◆高文兵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早在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就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并将其理解为“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并对文化转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在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中,重新审视文化自觉、重拾文化自

信,并且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大学更应有新的更大的担当。

一、文化自觉的当代中国价值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精神与智慧的凝结,繁荣的文化还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当代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融入全球化,就必须通过文化自觉建设先进的文化,以先进的文化塑造高素质的国民,引导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学校长时倡导建设“三支登山队”,政治登山队指辅导员队伍,科学登山队是因材施教的业务尖子,文体登山队是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都是在全面发展基础上对某一方面特长的培养和充分发挥。对辅导员的要求是学习必须优秀,对文体代表队也强调学习要求,有一门考试不及格就要退出;对因材施教生,又强调政治和体育的要求,要多做社会工作,多参加社会实践,坚持锻炼身体,“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四、演绎性教育和归纳性教育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教育主要采用的是演绎法,有利于打基础和训练,但是创造性不足;美国的教育主要采用归纳法,有利于创新思维知识的综合运用,但系统性不够。我们认为,演绎性教育和归纳性教育各有所长,需要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有自己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演绎性教育和归纳性教育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哲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都要体现,但不同阶段要有所侧重。演绎性教育是先讲普遍,再由普遍推及特殊。归纳性教育则是先从个别入手,再到一般。例如,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工商管理硕士(MBA)等专业学位教育就非常注重案例教学,启发学生从大量案例中发现一般规律。我们的教育哲学偏重于演绎性,和中国传统思维重视宏观思考有关,例如“天地人合一”。演绎性教育表现出来,就是强调知识的系统性、教学内容的完整性,这有利于让学生全面系统地了解某门学问和知识,对于基础知识的学习是有很大帮助的。

但问题是,我们的课程体系、教材内容上往往求大求全、面面俱到,企图将所有的相关知识都教给学生。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是永远学不完的,这种教育方法会使学生学习负担和压力非常大,甚至会使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归纳性教育则是从问题入手,一开始就使学生建立问题意识,像欧洲一些大学在推行的基于项目和问题的学习方式就是这种教育的集中体现。应该说,单一的演绎性教育或归纳性教育都是有缺陷的,大家都在思考如何结合。法国巴黎高师的办法是,一二年级进行严格的基础训练,偏重演绎性教育,三四年级则偏重归纳法。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无论是演绎性教育还是归纳性教育,对于学生思维方式的训练和知识学习都是重要的。科学的目标是要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and 发现。因此,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用与别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别人忽略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思维方式的训练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一方面是要教会学生学会用不同思维方式来思考,其实每一个学科都代表了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方式,都有合理之处,多种思维方式为学生解决问题提供多种路径,其间的碰撞也会产生创新的火花。另一方面,在同一学科领域,思维方式也有一个不断转变和提高的过程。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独立思考,加强理论思维训练,使逻辑思维和发散思维有效结合。总之,思维训练不容忽视,要放到与知识学习同等的地位上来。

【作者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吴绍芬)